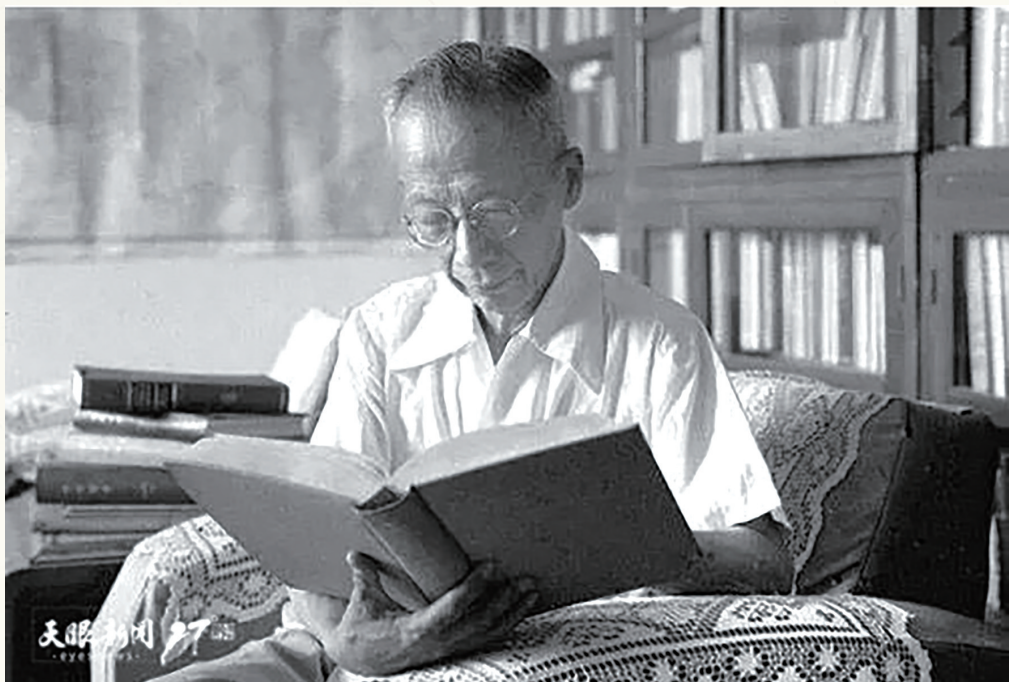


# 竺可桢主导文澜阁《四库全书》西迁贵州

本报记者 肖郎平

竺可桢是著名的气象学家。抗战期间，他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并主持浙大由东而西的“文军长征”。几乎是同时，文澜阁《四库全书》西迁贵州避难。

这不是巧合。近日，记者通过采访并梳理大量档案、文献后发现，竺可桢实际上主导了文澜阁《四库全书》西迁贵州的很多工作，有人将他称为文澜阁《四库全书》“卫士”。



竺可桢在家中阅读。图源于中国科学院院士文库

## 3 误解贵州的一段插曲

竺可桢在1942年8月19日的日记中说“贵州大学与中央均思染指也”，1945年4月3日的日记中又提到“知川黔方面有主张留文澜于成都者”。1944年12月9日，在文澜阁《四库全书》即将启程护送到重庆青木关的前一天，竺可桢在遵义和护送人员毛春翔、夏定城、李聚非见面。在这次见面中，竺可桢又听说中央图书馆欲得此书，他明确表示：“余谓文澜、文津可归中央，而此书将归浙江。”

1945年2月，文澜阁《四库全书》保管委员会成立，成员包括陈训慈、竺可桢、张宗祥、蒋复璁等。浙江省方志办原副主任顾志兴在《文澜阁四库全书》中记载，该委员会理由是为了妥善保管藏书，实际上是文澜阁《四库全书》返回浙江做准备。蒋复璁曾以教育部名义要求将文澜阁《四库全书》安置在南京，被张宗祥婉言拒绝。

毛春翔在《文澜阁《四库全书》战时播迁纪略》中讲述这段迁徙历史时评价：“陈叔谅先生之力居多。……浙大派车救书之危难于前，派人督运于后，指导曝晒于黔中……竺校长躬公，爱护乡邦文物……”

竺可桢关于文澜阁《四库全书》去留的日记，一方面表达了浓浓的桑梓之情，另一方面对贵州存在一定的误解。在相关档案发现之前，贵州无法辩解。转折发生在2015年。钟海珍说，

对文澜阁《四库全书》西迁这段历史，过去我们只能羡慕浙江有很多竺可桢、陈训慈、毛春翔等人留下丰富的研究资料，有一天突然想到贵州省图书馆应该有当年的档案。

果然，钟海珍在图书馆顶楼的铁皮柜里找到273页珍贵的民国档案。由于温度太高，已经有被虫蛀蚀的情况。欣喜若狂之余，她赶紧将档案放入零下80℃的冷冻箱将虫卵杀死后保存在恒温恒湿的环境中，并开始了整理修复工作。

这些重见天日的珍贵资料既见证了贵州的付出也澄清了真相，贵州没有截留文澜阁《四库全书》的意图。

1942年到1943年之间，原国立贵州大学校长张廷休反复请求善抄文澜阁《四库全书》并成立研究机构。张廷休在给蒋介石的呈文中说：“传抄全帙，留皮贵州，永广传布。”

贵州被允许抄写部分和西南有关的内容。钟海珍表示，张廷休“留皮贵州”指的是善抄本，而不是文澜阁《四库全书》。

钟海珍感到欣慰的是，一个阳明洞，一个地母洞，可谓贵州对传统国学作出贡献的见证。她笑着说：“只要是国家图书馆和浙江省图书馆的人来贵阳，都点名要去鹿冲关森林公园看看地母洞。”

## 延伸阅读

### 竺可桢在遵义的办公室



竺可桢院士

浙大西迁途中召开的320次行政谈话会，有256次在遵义召开。而在遵义召开的这些会议，至少有200次是在子弹库的校长办公室里召开。

#### 1. 先江公祠办公，后迁何家巷

1940年1月16日12时15分，竺可桢校长同理学院院长胡复院长、教育系陈剑修教授乘四号车赴遵义。当天17时到达丁字口环球旅馆，遇见先期抵遵义的工学院李熙谋院长、史地系张其昀主任等。从他们那里得知教育部陈立夫部长中午在遵义停留，专程去了遵义师范，要求地方上将师范让给浙大，而师范则迁到深溪水的梧村。

第二天，竺校长把办公室设在遵义江公祠办公。

江公祠是为纪念咸丰年间因保境安民战死沙场的遵义知县江炳琳，由遵义士绅在1928年召开了第一次校务会议，即第三十次。这次会议，讨论了教员待遇和行政会议的组织、章程问题。

5月5日星期天，一大早竺可桢校长就赶到江公祠，参加数学系教授章用的追悼会。

当天中午，随浙大总办事处前往闹市中心的何家巷，竺可桢校长也将他的办公室迁到了何家巷四号。

何家巷四号与三号何家公馆木测量室。天井正对的中间堂屋为会客室，左边前间大一些，是会计室，后间小一点，为文书课；右边外间为秘书室，而竺校长的办公室是靠里的那一间。

#### 2. 子弹库办公室一待四年

1940年11月30日中午，竺可桢校长从重庆出差回到遵义，稍事修整，很快就赶到办公室。当天的日记里，他这样记载：“下午一点半至校中（何家巷四号），阅往来信件并批文书。”

后来，何家巷四号成了浙大基督教青年会的学生救济委员会服务处，其负责人钮志芳是中共地下党员，浙大的进步学生还可以在这里阅读到《新华日报》等报刊。

坐落在协台坝与官井路交汇处的子弹库办公室，曾经是清末遵义知府袁玉锡“废科举，行新学”举办的遵义府中学堂。1926年更名为“贵州省立第三中学”，人称“老三中”，首任校长是著名教育家黄齐生，从“老三中”走出了陈沂、周林、韩念龙等人中龙凤。最终，浙大的总务处、文学院办公室、心理学实验室、气象观测所、部分教室、员工宿舍等陆续迁入，使之成为浙大的校本部行政中心所在。

而竺可桢校长的子弹库办公室，自1941年10月18日从何家巷四号迁来后，一直到1946年5月16日离开，共四年零七个月的时间。

除了碓窝井九号寓所，竺可桢校长在浙大西迁遵义办学七年里，所待时间最多的，就是子弹库里的这间办公室。

在这里，竺校长为浙大的生存、发展和崛起，谋划布局，事无巨细，尽量亲力亲为。浙大西迁途中召开的320次行政谈话会，有256次在遵义召开。而在遵义召开的这些会议，至少有200次是在子弹库的校长办公室里召开。只要不是因公出差，绝大多数都由竺校长主持。

在这里，竺校长关心学生的前途命运，宵衣旰食，呕心沥血。1942年1月16日，得知学生即将为“倒孔”要组织游行的竺校长，清晨六点就赶到办公室，商量如何劝阻学生，尽量避免与军警发生冲突，还派人去找高文伯专员请派军警维持秩序。为营救被抓走的师生，竺校长还多次开会，安排营救计划、措施。

在这里，竺校长忙里偷闲，深入研究。首发于《思想与时代》第34期的《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》，就是竺校长在1944年5月25日至6月11日，用三个星期时间，白天在办公室利用空闲构思、草拟，晚上再回寓所加工、修改完成的。

#### 3. 一首诗思遵义

1946年5月16日8时，竺可桢校长最后一次来到子弹库的校长办公室，将下学期各院系教授、讲师、与助教的名额排定，交付秘书俞心澍后，于十点左右离开。

下午三点半，竺校长乘一辆破车，夜宿桐梓，再赴重庆，然后，辗转南京、上海，于6月11日回到杭州。而再回首，已是十五年以后。

1961年5月，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竺可桢校长，带队考察“南水北调”，从北京飞成都，在四川、贵州考察水利、气象近一个月。6月15日下午，竺校长专程从贵阳赶到遵义，一路拍下不少照片，还写下一首落款为“六一年六月十五日重到遵义作”的律诗：一别遵城十五年，重游旧地如登仙。红花岗上千株雪，湘水桥边万斛田。厂矿商场既满合，园亭黄舍亦连绵。播州自古称穷僻，黔北于今看最先。

用以表达他对黔北大山中遵义这座小城最深的情思、最深的牵挂和最深眷恋。

来源：浙江大学

## 1 建议文澜库书内迁避难

《四库全书》是中国古代乃至全世界规模最大的文化工程，原本有7部，分别藏于全国7座藏书阁。其中，杭州的文澜阁《四库全书》因抗战期间西迁避难等曲折经历而富有传奇色彩。

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，日军经常轰炸上海、杭州等地。时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陈训慈意识到，文澜阁《四库全书》面临危险，他一边申请迁移经费，一边动员馆员赶制书箱准备转移。

1937年8月，日寇登陆上海，杭州危在旦夕。文澜阁《四库全书》于同年8月4日首迁富阳，10月25日再迁建德，次年1月底三迁龙泉。

当时，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及省教育厅对文澜阁《四库全书》的安全问题并不重视。陈训慈只好自己筹款，变卖家产田地，向亲友们借款，在省内辗转迁徙。在《运书日记》中，他表达了忧惧不安的心情，“瞻念万一疏失，将何以对浙人，何以对文化，不禁殷忧”。

在文澜阁《四库全书》迁徙建德期间，运书的船搁浅。走投无路之下，陈

训慈想到浙大有卡车，求助浙大朋友和他的老师竺可桢。竺可桢抽调一辆卡车帮忙运书3天。

1938年1月22日，竺可桢电告民国教育部部长陈立夫，报告文澜阁《四库全书》运往建德的情况，建议为了安全起见运往内地为好。起初，浙江省政府并不重视，甚至牢骚满腹。

在教育部3次来电催促浙江省政府之后，浙江大学派了教授和浙江省立图书馆工作人员一起负责运书，这些国宝级图书终于在1938年3月踏上西迁贵阳之路。

据日本学者记载，1938年2月22日，日本“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”派了9个人从上海到杭州寻找文澜阁《四库全书》。

幸运的是，文澜阁《四库全书》躲过了这一劫。

凯里学院大数据工程学院杨建忠教授研究竺可桢的日记后认为，浙大西迁贵州，除了避难和物价便宜之外，也有追寻王阳明足迹和保全《四库全书》的因素。

## 2 心系地母洞防潮问题

1938年4月底，文澜阁《四库全书》抵达贵阳。

1939年2月4日，18架日军战机轰炸贵阳，伤亡人数达到2000多人，史称贵阳“二四轰炸”。

2月26日，到贵阳出差的竺可桢特意去藏书地点张家祠看望幸免于难的文澜阁《四库全书》。张家祠离市区二三里路，而且靠近火药局，仍有安全隐患。不过，此时贵州省立图书馆馆长蓝端禄等人已决定，将文澜阁《四库全书》转移到郊区的金鳌山地母洞。

6月23日，再次到贵阳出差的竺可桢步行1个小时，前往地母洞查看文澜阁《四库全书》的贮藏情况。地母洞通风情况还好，洞口在下午时分也能晒到太阳，但洞的后部比较潮湿。开箱检查发现，有的图书有受潮现象。竺可桢和同行人员现场商定，顶棚木板要换成瓦片以防雨水，同时，要有专人负责晒书工作等。

贵州省立图书馆迅速落实，7月9日呈报改造项目预算，7月15日就申报验收。贵阳多雨，加上地母洞中午以后才有阳光，曝晒工作从9月11日开始到12月5日结束。曝晒中发现，图书确有潮气，不过没有霉损情形。运输途中，12箱图书曾经落水，颇多水迹泥痕。这些图书特意多晒了几天并被清理干净。

1940年3月18日，陈立夫明确要浙大就近“协助督察”。同年7月5日，竺可桢获悉，地母洞中所藏文澜阁《四库全书》仍有潮湿的情况。12月19日，他在对在遵义出席公务活动的贵州省政府主席吴鼎昌提出，文澜阁《四库全

书》放在地母洞不妥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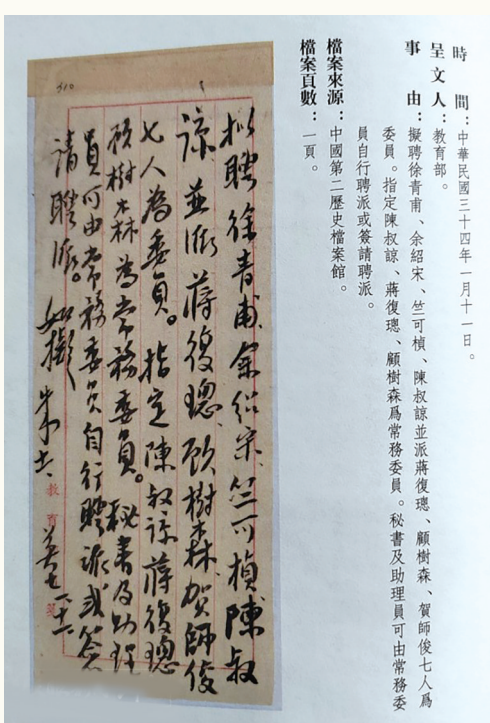
1942年4月19日，竺可桢见到蒋介石时又提到文澜阁《四库全书》的事。7天后，蒋介石方面给教育部和贵州省来电要求将文澜阁《四库全书》移往离贵阳较远的安全干燥的地点。贵州省图书馆原馆长、原省古籍保护中心主任钟海珍表示，应该是竺可桢在见面蒋介石时提出了建议。

检查发现，保护工作非常细致，没有发现书籍出现霉烂的情况。书箱放在木板上，离地约两尺，空隙间放了木炭和石灰。工作人员每隔一个月就把全部书箱内外上下互换位置。每部书之间有隔板保护，每箱衬有油纸、牛皮纸和放置樟脑丸，既防潮也防虫蛀。每年九月、十月间，贵阳晴天较多，所有书籍都要取出来翻晒一遍。1943年起，除了秋季晒书外，还增加了春季晒书。

1943年11月24日，竺可桢再次向时任贵州省教育厅厅长欧元怀谈到地母洞的潮湿问题。欧元怀表示，3次实地考察，相当干燥，如转移别处担心有空袭危险。

对地母洞如何防潮问题，竺可桢可谓不厌其烦。相应地，贵州和有关方面也有求必应，保护措施越来越来越来越细。

1944年，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，桂林、柳州失守，贵州危在旦夕。11月30日，竺可桢致电教育部：“浙江文澜阁《四库全书》原存贵阳地母洞，兹以战局渐紧，此书为我国仅有之精华，似应及时择地迁运，以存国粹。”于是，文澜阁《四库全书》向重庆转移。



↑ 1944年11月30日，竺可桢紧急请求迁运文澜阁《四库全书》的电文。资料图片



← 文澜阁《四库全书》保管委员会初拟名单，后增加张宗祥。资料图片



竺可桢带领浙大师生西迁遵义，时为浙大物理系所在地。资料图片

在贵州湄潭举办的中国社成立30周年学术活动中，竺可桢作学术报告。资料图片